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論傑索普派在建構國家理論方面的啟示

The Inspiration of Bob Jessop and His Discipl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Theory

doi:10.30390/ISC.200408_43(4).0006

問題與研究, 43(4), 2004

Issues & Studies, 43(4), 2004

作者/Author：陳璋津(Chang-Chin Chen)

頁數/Page：143-17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8_43\(4\).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8_43(4).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傑索普派在建構國家理論方面的啓示

陳 璋 津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摘 要

建立國家理論以說明國家的宰制和統治方式的接合方法，是傑索普和他的門徒偉大的貢獻和啓示。但是該方法的內容存有許多缺陷，難以運用，也難以把其他理論所使用的概念接合起來。本文試圖通過以現實為根據的問題設定來更正這些問題，並且擴展他們的方法。經過這道手續，接合的方法在建構國家理論架構上將會變成為可行的工具。

關鍵詞：接合、國家理論、縫合、社會、社會面、文化霸權

* * *

壹、整合理論的「接合的方法」

利用整合和整理各類形形色色的理論範疇的方法，來架構一個概括性的大理論架構，以方便我們說明一些難以理解的具體現實，然後運用這項研究成果，指導現有的政治運動，向來是進行理論工作的研究者所努力的一個方向。這種理論研究途徑的工作方式，就是要在相關理論研究的主題裡，把各門各派的理論範疇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通過理論加工的方式，重新建構（install）或構築（construct）成爲一些可行的概念，使各門派不同的或相同的理論範疇研究，因爲通過理論加工把它們之間原有的關係或聯繫找出來，成爲可結合在一起而且在不同的理論位置上相互聯繫起來的範疇。當這些範疇經過重新建構或加工後，把它們放到按照「問題設定」（problematics）^①所

註① 所謂「問題設定」，就是對於一定的對象或事物提出問題，並且對這個問題提出解答的方式。通常在一部作品、著作，或者所謂的「文本」裡頭，作者對於看問題的出發點、或者角度，對於他所使用的概念或者試圖解決的問題提法，都不會預先告訴讀者的，或者根本就不會告訴讀者。更遑論說，對於問題，他是利用那一門學派的觀點來思考，或者來解決問題，或者說會不會有所偏頗或是不足。這些隱而不彰的東西，卻是讀者在理解他必須在解讀中理解的情況中所迫切需要的手邊工具。如何不讓「問題設定」容易產生出來的問題產生，然後順利輕易、無障礙地向一部作品、著作，請益，英譯本阿圖塞（Louis

確認的大理論架構位置上面，這個大理論架構確實宛若當下具體現實中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它們是以概念表現的方式，生動地體現具體情況的一套說明問題的理論架構。自然，這些可行的概念就俱備了一個要件，即它們不但足以指涉其所代表的內容，而且它們已經在概念中隱含了能夠一起聯繫起來說明現實的各種關係的一種概念之間的關係。重新建構或者構築，就是把各門各派的理論範疇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不具具體現實內容的，沒有體現它們原來在現實裡應有的關係的，重新進行理論加工，以我們用來當作尺度的那個新的問題設定加以生產，使它們成為具有具體現實的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②因而使它們能夠跟其他同樣以新的問題提法這種方式生產出來的一些概念，不能不相互聯繫起來。這也是在理論上一般所謂的「接合的方法」(the method of articulation)。這種情況正如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莫菲(Chantal Mouffe)所說的，「同源的河水滔滔奔向四方，但是卻跟其他水源流下的支流匯流成河。」^③

這項理論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不容易。儘管如此，有許多理論工作者朝這個方向進行他們的工作。在這類的理論工作中，晚近有一種理論工作很值得我們提出來討論。原因有四點：一、朝這個理論工作方向研究者衆，而且他們是有傳承的；二、他們的理論工作在當代歐洲的左派思想和左派運動中，產生深遠的影響；三、他們的理論研究是有啓示作用的，有利於建構另一套的理論架構，應用於研究政治社會學相關領域的題材；四、他們的理論研究具有建樹的地方頗多，只要把他們的理論研究部份有問題、呈現理論缺陷和空白的地方進行加工，重新把加工過後已經深化內容的新概念放回到它們該歸屬的概念體系裡，就可以豐富我們的理論視野，說明現實問題。這一種理論工作，就類似圍繞著傑索普(Bob Jessop)的「接合的方法」在國家理論方面所進行的理論架構建構工作。不用說，傑索普是這一派「接合的方法」的開山始祖。最近傳承的得意門生有貝特拉姆森(René B. Bertramsen)、湯姆森(Jens

Althusser) 作品保衛馬克思(*For Marx*) 裡頭的「術語彙編」，在揭示何謂「問題設定」時，告訴我們一個方法。它表示：我們不能孤立地考察一個詞語或者概念；詞語或概念只存在於它被使用的理論的或意識形態的架構，即它的問題設定中。這個問題設定，其實也就是思考角度、看問題的出發點，或者看問題的切入點，以及以這些東西來從事論述而牽扯到的那些使用到的語言或詞語的總稱。因而掌握一個作品所使用的理論的或意識形態架構，即能掌握一部作品所使用的詞語或概念。一個詞語或概念只有在它所處的那個概念體系或架構中才能夠得到理解，反之亦然。能夠如此，即可切入作品裡頭談論的東西。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請參考下列作品：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p. 253~254. 阿圖塞著，陳璋津譯，保衛馬克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4年)，頁305；Göran Therbor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New Left Review*, 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Verso Edition, 1983), p. 126; 泰爾朋，「法蘭克福學派」，*New Left Review* 編，*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選*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3年)，頁160。

註② 馬克思，「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38。

註③ 拉克勞和莫菲著，陳璋津譯，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3年)，頁10；(以下的拉克勞和莫菲兩人合著的作品，除非註明為其他的出處，否則皆是引自本書)；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Press, 1985), pp. 4~5.

Peter Følund Thomsen) 和托爾芬 (Jacob Torfing) 三個人。他們的力作是**國家、經濟和社會** (*State, Economy & Society*)。而夾在他們之間的重磅級人物，就是頂頂有名的拉克勞和莫菲。拉克勞和莫菲現在於西歐進行「基進民主」 (radical democracy)，是非常有名的兩位左派人物，特別是後來莫菲在他們兩人的理論力作**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之後，在其力作**回向政治面**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中，為「基進民主」提出一套具有說服力的理論基礎。^④

本篇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傑索普派的「接合的方法」，討論他們的建樹，並試圖從研究他們的理論建樹所取得的啓示，討論出一些在理論研究和概念生產中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自然，在討論他們的理論建樹和思考方向時，本篇研究會做些嘗試，在重整他們的理論建樹的同時，把這種思考方向所取得的理論思考成果應用在生產有關理論架構的理論這件工作上，看能否按照這種思考的成果，產生一種可行的、說明現實複雜性的、有關國家問題的理論架構，以利我們在爾後的理論生產工作中利用這個理論架構，逐步構築和填補尚在空白狀態中的、具體的理論知識體系內容來指導政治行動。

貳、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

「接合的方法」這個理論課題為何會興起於國家問題中，其實原因相當簡單。最重要的一項即是：雜多的理論研究不能相互參酌應用，它們所使用的概念無法說明應該說明的概念之間的複雜聯繫。關於國家問題的研究，向來是許多社會科學家、社會哲學家 and 政治理論家所關心的對象。近年許多重要的研究紛紛出籠。細緻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富。但不管這些論著是宏觀的研究，或者微觀的研究，總令人感覺有些不足和遺憾。原因即在於理論界派系雜然並陳：有自由主義 (Liberalism)、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多元主義 (Pluralism)、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和馬克思主義 (Marxism) 等大的理論流派，底下又可以細分為各式各樣的派系。但是要歸類這些各式各樣的派系相當困難。從這些不同理論派系生產出來的研究成果，由於認識角度和對於問題的提法不同，經常出現無法互相補充和整合的情況。因此儘管研究成果衆多，可是呈現出來的現象是紛亂無章、片片斷斷，無法讓我們能夠對國家問題或者與國家問題相關的其他政治行動問題，取得有系統的、全貌的和深入的理解。尤其不同理論範疇的研究之間，根本無法連貫。更不用說，相同的理論範疇的研究之間，能否相互間促進理解，說明問題。有些理論派系對於問題的提法，使得其他理論範疇的研究在那些場合無存在餘地，更是讓人無從想像這些理論研究範疇在可能有的概念體系中所居的位置。這就好像有人蓄意密謀暗中除去這些理論範疇之間的關聯，存心讓人看不出問題所在一樣。或者，就是有些研究者提出這些理論範疇來研究，可是在那種理論領域也講不出具體的理論意義，因此讓他們的研究變得平淡無味，如同文字

註④ 請參考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Press, 1993).

遊戲。還有，有些理論範疇的研究成果，擺在其他的理論派系的理解中，變成無法設想，因為其他人的理論提法裡不會有這些理論範疇。最後要是有人想把問題都整理出來檢討一番，結果還是會形成無謂的理論論爭和澄清動作，平白消磨諸多的研究精力和心血。

問題重點之二，是理論派系雜然並陳所造成的各理論派系單打獨鬥的局面。理論界各家單打獨鬥的精神似乎已成習慣和風尚，傳染到同一個理論派系內，甚至於在同一個理論派系內也相當缺乏理論研究的團隊合作和分工精神。缺乏理論研究工作的團隊合作和分工，免不了會造成理論研究工作重複生產，形成精神浪費。單獨針對一個理論概念，就可以有十幾個派系版本的生產工作和研究。相對地，由於沒有團隊的橫向聯繫，不少理論領域乏人問津，永遠成為理論的缺口。另外，有部份理論家力圖從事個人趣味的研究，所研究的理論範疇相當冷僻。由於缺乏理論架構的說明，無法讓人摸透它們的用意，就算是有心放進一套可以說明各種聯繫的概念體系中也無從做起。因而無論就適用性，或者是進一步延伸研究來說，意義都不大。搞宏觀研究者，專門眼觀大處；從事微觀研究者，專門著眼於細處。惟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根本搭配不起來，沒有接觸的交集點，更遑論後來研究者能否從這些研究心血裡取得傳承，獲取參照系（reference index）的方便，因而通過理論生產的工作提昇理論研究的境界。

整體來說，有關國家研究的國際理論界的狀況是這樣：理論範疇的研究成果，不是眾說紛紜，眼花撩亂，不做批判整理，簡直就無法和同一個派系中其他相關理論範疇的研究聯繫起來的地步；不然即是：理論範疇的研究無法補充相關理論研究的缺口，無法成就前人未完成之套件。因此無法和其他的理論研究範疇一起作為原料整合和加工，生產出說明問題的一套理論架構。這樣的一研究狀況，看似成果豐碩，實則都在原地踏步。每一個後學者對某一個主題想理解，都需辛苦地從根本著手。而這個起步，不是全面的起步，實則為忠於某一派的提法後，再從那裡開始的起步。要想全面起步，還是得每一次都從另外一些（不是一種）派別，重做一次從根本打基礎的起步工作。英國的社會哲學家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很無情地批判過這種狀況。他說：「我們是生活在傳統的理論來源都還沒有為我們準備好的一個世界裡。」^⑤

換句話說，後來的研究者對某個主題要想取得整體和全貌的理解，不但要很辛苦地做各派系對某個理論問題的提法的整理工作（這件工作的份量相當龐大。我們先且不提從何種研究角度來做這種工作才算是中肯的這一個問題），而且還需填補各派系留下的大量理論範疇研究之缺口。這不是一件簡單的理論工作。這些都是近年來單純的國家理論研究領域所留下來的問題，也是迫切需要理論界的能人逐一著手解決的一件大工程。因為這樣，造成了接合各門派理論範疇的需求，也促成了「接合的方法」的形成。

這種重新建構或者構築理論的方法，傑索普首先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裡頭，

註⑤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166.

提出來討論。他賦予這種方法一個名稱，為「接合的方法」。^⑥傑索普提出這樣的一種「接合的方法」，目的就是像我們前面稍加說明的，是要在認識論上，為在現實世界存在的一些可以產生一定結果的「偶然的必然性」（contingent necessities），^⑦提出一些理論說明。我們在這裡以他比較扼要說明的著作，即**國家理論：把資本主義國家放到它們的位置上**（*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加以引述，然後再把他的結合方法，以批判討論的方式揭示出來，產生我們所需要的理論生產工具。

傑索普認為，為適當地瞭解「偶然的必然性」這些事件，就「需要我們把來自不同理論系統的概念、假設和解釋原則結合起來，讓它們跟一定的、在理論上要解釋的事件聯繫起來。」^⑧傑索普建議，適合的理論構築的方法，是以兩重運動為基礎的方法，即：「首先，沿著分析的一個層面，從抽象到具體；而其次，通過分析現實世界的不同層面有差別的接合，從簡單到複雜。藉著結合這兩種理論發展的形式，就產生了越來越合適的解釋。」^⑨

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取材自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五七年經濟學手稿（*Gründrisse*）中所講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過卻沒有體會出馬克思思想的重點，走向偏峰。馬克思在那裡表明，雖然思維是表達現實的工具，「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⑩但從現實直接的表象開始分析現實是不對的。因為面對任何素樸的簡單的範疇或概念時，如果沒有在理論方法上先把具體的現實擺在眼前，弄清它在所處的社會關係中的各種聯繫，掌握它在這樣一些關係中的表現，然後在理論上予以加工、抽象成為具體的範疇，那麼「它就什麼也不是」。^⑪這個加工的工作，是從表象中的具體，經過更切近的規定後，加工達成簡單的抽象概念，取得一些最簡單的規定。這些抽象的概念，雖然說它們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但卻由於它們內含的一些最簡單的規定，等於在沒有展延、拓開之前，已經有了可以跟其他相關聯的一些抽象概念「接合」的波節點。這些抽象的範疇一旦展延，開始上升到它們與其他抽象概念之間的聯繫，就形成一個比較大的理論範疇，這個比較大的理論範疇由於是許多規定和關係的結合體，因而又是「一個具有許多規

註⑥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Press, 1982), pp. 213~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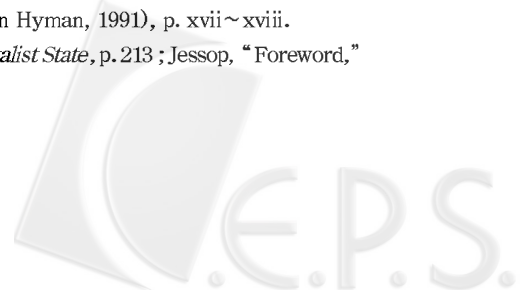
註⑦ 這是指某些事件或運動集中起來可以產生統一效果的情況。傑索普在這裡只是用了一個「術語」，其實它的內容就只有這些而已。有關「偶然的必然性」理論論證的說明，對於我們理解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不是不可或缺，這裡就不加說明。詳細解說，請參考拉克勞和莫菲，前揭書，頁12~20。

註⑧ 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1; Bob Jessop, "Foreword," in René Bugge Bertramsen, Jens Peter Frølund Thomsen and Jacob Torfing,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1991), p. xvii~xviii.

註⑨ Jessop, *State Theory*, p. 11. 相類似的陳述，見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p. 213; Jessop, "Foreword," p. xviii.

註⑩ 馬克思，「導言」，頁39。

註⑪ 同前揭書，頁37。



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這個「豐富的總體」是我們思維所分析的具體現實中的一個層面。將作為思想具體所體現的具體現實的這些多個層面「接合」起來，能說明和分析具體現實的思想總體體系就開始成形。

馬克思所謂的「表象的加工」，是將「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是將概念製造成為含有具體規定的一些簡單的範疇；從這些簡單的範疇上升到具體，是讓這些「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這個「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⑫前一種過程是從表象到抽象；第二種過程是從抽象到具體。這兩種加工過程的總合，就是用思維者的頭腦，占有和掌握這個世界。

為什麼把直觀或表象加工製造成為抽象的概念，一定要聯繫具體的現實，現實世界才會是範疇的運動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原因是，抽象的範疇或概念，跟任何其他抽象的範疇或概念之間的聯繫，及任何具體的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都不是普遍的、一般的和必然的。馬克思舉出「占有」和「貨幣」兩個簡單的範疇為例來說明。「占有」這個簡單範疇在野人那裡，並不表現為法權的關係；而在存在著家庭或主奴關係之前，「占有」這個簡單範疇根本還不存在。同樣的，「貨幣」是一個古老的範疇。但部份發達的協作和分工的經濟形式中，卻不存在著貨幣。^⑬另外，儘管有些簡單範疇正因為它們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適用於一切時代和社會。但是因為這些簡單範疇在許多社會和時代產生的作用不一，它們在這些時代和社會中的各式各樣的聯繫和關係也就不同。簡單的規定和抽象的概念，是如何跟具體的現實產生多種多樣的聯繫，需視「實際情況」而定。馬克思總結：「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於這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分的意義。」^⑭

傑索普取材馬克思上述的觀念，但沒抓住重點。他表示，馬克思認為科學分析的目標，「是要把『具體的現實』當作『思維具體』，這就是說，當作許多不同規定的複雜綜合，再生產出來」。^⑮所以他朝這個目標前進，努力從事分析許多在具體場合被結合起來的規定，並證明它們是如何地在因果關係的一種偶然結構裡，作為「必然的，以及／或者」充分的條件，產生相互的聯繫。他以為，這樣就「必須有在一個分析的單獨層面內部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例如：從資本的一般到特定的資本），和取自不同分析層面的一些規定的結合（例如：根源於政治宰制關係中的人民民主的對立，與根源於經濟剝削關係中的階級對立）」^⑯。

至於如何把「具體的現實」當作「思維具體」，然後又從抽象到具體呢？傑索普

註⑫ 同上註，頁38。

註⑬ 同上註，頁39、40。

註⑭ 同上註，頁43。

註⑮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p. 212.

註⑯ *Ibid.*, p. 213.



的方法很奇怪。他論斷，「其實不能直接進入現實世界。因此所有的理論構築和評估，都是通過特殊的概念體系和經驗調查技術來媒介的。」他也論斷，「從不發生由不帶理論的『具體的現實』到帶有理論的『思維具體』的這種運動：接合的方法總是在理論的言說領域發生。」^①傑索普的「通過特殊的概念體系和經驗調查技術來媒介」，就是他所說的「接合的方法」。這就是他理論的重點。他要通過這個「接合的方法」，構築理論，生產能夠說明需要解釋的事件。

「接合的方法」進行理論構築的方式如下：只要評定那種理論或是解釋，能夠說明等待著解釋的事件，就可以把它們當作是合適的理論，根本不必考慮它們的抽象層次。但是萬一這種理論或解釋不能夠在不產生矛盾的情況下，擴充解釋到比較低層次的抽象，那麼就要把它看成是不合適的。至於一種理論或解釋到底合適或者不合適，「取決於調查者所進行的特定理論架構」。所有的理論對象一旦能夠在不同的抽象層次上加以研究，那麼就有可能解決有關存在的抽象情況和被理解的實際形式之間發生決裂的問題，即理論進入了現實世界。最後，「適合於不同分析層面的一些解釋，應該都可以相稱」。^②接合所生產的思想體系於是乎完成。

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忘掉了理論的「抽象的規定性本身」，「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於這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分的意義」。任何的理論抽象，都不能是主觀的臆斷。不能夠說因為它們通過「調查者所進行的特定理論架構」，以為能夠說明某些有待解釋的事件，它們就含有「抽象的規定」，就含有它們之間原本的聯繫。更離譜的是，並非「適合於不同分析層面的一些解釋，應該都可以相稱」，它們就確實可以在整體中含有多種多樣的聯繫，可以在「思維具體」中談到「具體的現實」中的各式各樣的聯繫。反過來，是應該「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繫」，^③不能從自己的直覺任意把「現實的具體」當作是「思維的具體」，偽造事實原本的聯繫。傑索普到最後，似乎完全忘掉了理論接近現實的意義。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是否能夠發展出一套能夠說明現實的理論架構，不想可知。

叁、接合的問題和理論過渡

傑索普的問題出現在理論接近現實時所產生的問題。這類問題，正如英國文學家麥克唐納（Diane Macdonell）的說法一樣，^④是文藝復興以來許多理論家力圖運用一種形式，讓知識能跟現實產生關聯的同一類問題。但這類問題並不容易解決。這「一

註① *Ibid.*, pp. 213, 214.

註② *Ibid.*, p. 217.

註③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頁27。

註④ 麥克唐納的說法是這樣說的：「從文藝復興以來，許多理論家都打算這樣主張：是有一種使（科學或其他的）知識能夠跟現實產生相互關聯的中立的和一般的形式。」見麥克唐納，*言說的理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9年），頁87。Diane Macdonell,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7), p. 64. 這裡是轉用其說法。

種形式」，其實就是知識上有關認識經驗事實（即現實）的知識論。不過，不管是哪一種門派的知識論，都如興達斯（Barry Hindess）、希爾斯特（Paul Hirst）、庫特勒（Antony Cutler）和休塞恩（Athar Hussain）所言，非擁有特權的真理。興達斯等人的說法是：任何知識論都一樣，沒有任何的特權，能夠斷然確定通過它們自身，通過它們本身的知識，就能夠產生概念和現實之間關係的這一關聯性。^①惟興達斯等人的說法，只對一半。因為，一方面，知識本身要是像經驗主義所以為的，認為是從經驗取得的，這種知識從經驗取得當中是否確實真的跟經驗產生了完整全面的關聯，原本就是一個問題。再加上需倚賴一種從過去經驗取得一直累積下來的知識結晶，即從過去積累下來的知識抽象、歸納出來的法則：知識論，來證明這種從經驗中取得的知識是跟經驗產生關聯的，那麼這根本就是循環論證。還有，未來的新生事物、事實和經驗，是現有經驗到目前為止所不能取得的。這都是現有知識的不確定性、不固定性、非統一性和不完整性的表現。確實這種知識論，不具有證明知識能夠跟現實產生完整全面關聯的這一特權的真理。另一方面，知識本身要是像理性主義所以為的，認為世界是一種理性的秩序，概念就賦予了現實的本質，那麼這種認定知識跟現實產生關聯的方式，更不具有特權的真理。^②興達斯等人的說法另外一半不對是因為：任何一種門派的知識論，都有一套占有現實的普遍真理或者擁有特權的真理。它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僅在於不同門派看問題的標準。^③作為知識對象的客體，如果不像經驗主義所以為的，是通過感官的經驗取得的，那麼說明客體的這個概念或範疇又是那裡來的；又感官若非是占有現實的媒介，那麼作為說明客體的知識又是如何占有它所表現的客體？這些的確都是問題。另外一方面，作為概括客體的知識形式，即範疇，如果沒有像理性主義所以為的那樣，說明它是能表現客體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具有統一性的形式，那麼又能用什麼來概括客體？這也是個問題。

對與不對，如何說明這項矛盾？事實上這項矛盾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任何一種門派的知識論，通通都有也通通都不具有它們一套占有現實的普遍真理或者是擁有特權的真理。問題不在於擁有特權，而在於「什麼時候」擁有特權，什麼才是它們的「真理」時刻。展現得太早，是表現了不該表現的內容；說得太遲，又沒有概括到新生事物，內容更有缺陷和不足。

經驗主義在此時此刻擁有一套占有現實的普遍真理或特權，但非彼時彼刻。經驗

註① Antony Cutler, Barry Hirst and Athar Hussa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ume 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7), pp. 211~228.

註② *Ibid.*, pp. 212~216; Barry Hindess,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77), pp. 190~228; Barry Hindess & Paul 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An Auto-Critique of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p. 10~19; Barry Hindess & Paul Q.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ess, 1975), pp. 1~5; 麥克唐納, 前揭書, 頁 87~89; Macdonell, *op. cit.*, pp. 64~67.

註③ Hindess & 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pp. 12~13; 麥克唐納, 前揭書, 頁 89; Macdonell, *op. cit.*, pp. 66.

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接近了到它經驗到為止的具體現實，但是到那為止就「滿足」了，未能繼續概括「從此之後」的內容。理性主義的知識論擁有的那一套占有現實的特權真理，是僅僅存在於人類理性臻於完美高峰境界的那一霎那間。但那一時刻永遠不會到來，除非時間停滯，人類不再發展，終止了智力的推進，否則在人類理性臻於至善之前，永遠存在著新生事物等待著人類的理性。理性主義的問題在於：永遠把未能滿足的概念，超前提出來。而且永遠超前。理性主義在人類智力的歷程中，成為知識上的「劊子手」，同時還是野蠻專斷的「劊子手」。它在人類知識的發展過程中，先行屠殺了人類智力發展的能力，宣告人類的智力不再能夠往前推展下去。

那麼，占有現實的普遍真理或者是擁有特權的真理，看來是受制於歷史。這就是矛盾，也說明一切。換句話說，只有「當下現實」，只有這一霎那（不過這段環節，在整個歷史的長河裡，時間已經夠長了），才是知識占有現實，知識跟現實產生關聯的一切真理和特權的依歸。在這一場合，迫切和確切的問題是如何在這一時候占有「這一時候」的真理。這樣說來，爭議知識論是否為占有現實的普遍真理或者是擁有特權的真理，是無益、非現實和不切實際的。我們應該在知識論上奉「歷史主義」（Historicism）為判斷的圭臬，努力讓知識趨向現實。在歷史長河的當下現實這一霎那，取得說明當下現實問題，連帶能解決當下現實問題的理論架構。

作為知識的理論要能夠跟現實產生關聯，哪怕只有一點關聯，就應該讓理論本身「懼滿溢」，理論永遠處於「想飽含又不能飽含」現實的狀態，永遠處於開放的和不確定的狀態中。也就是應該以「歷史主義」這一知識論的認識態度來對待理論，而這本來就是現實世界對於理論的無上命令，也是理論本身的宿命。「歷史主義」的認識態度是：②歷史主義是關於知識限制的一種立場，說明人類的理解怎麼總是它歷史情況的「俘虜」。歷史主義不費功夫來證明知識的妥當性或「對錯」，反過來是把知識、標準和假設，看成是構成客觀性的歷史傳統的一部份。哪一些知識是重要的，總是跟傳統有關。知識無非是「表現」根本不能超越的那一個世界的一套思考角度而已；知識僅僅顯現為一種展現的東西，它描繪杵在那裡的東西。所以這種知識懷著的是一種「有限態度」。^③「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認識事物，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④知識與現實之間的統一，這種統一的邏輯只有在「不容置疑」（*a fortiori*）的情況下，才能提得出來。而且那是後驗的，即「在這之後」（*a posteriori*）。我們可以說，「有」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存在著」，在這裡無非是嚴格地指涉純之又純的指稱的可能性。可是，這是「一種空洞的指稱」，「一種沒有說什麼的指稱」。^⑤

註② 我借用了達米可（Robert D'amico）的研究成果，在這裡概括他在文章中的幾個段落的說明。見Robert D'amico, *Historicism and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89), pp. x~xii.

註③ 請比較傅珂（Michel Foucault）對於知識的態度，見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4), pp. 32~50.

註④ 恩格斯，前揭書，頁 202。

註⑤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227.

當然在此要說明的是，從這種對待知識的「歷史主義」的態度裡必然取得的邏輯結論是：所有的理論架構一定都具有「時代性的缺陷」。這是它的宿命，因為只要是具體的、合乎現實的理論架構，都永遠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而且「永遠地落後於後一個時代」。理論架構超前於後一個時代，是空泛、烏托邦，或者幻想、理想，是拿來當作膜拜、朝奉和追求的；理論架構落後於當下這個時代，是不具體、落伍的，是會被遺棄的。所以，合乎時代要求的、具體的理論架構，肯定是要經常因時代的進展和發展而遭批判。不用說，這個理論架構是開放的、非封閉的體系，因而是暫時性的，變動的，經常需添加內容的，要發展的，內在含有緊張性和矛盾的，要接受新生事物的。宣稱一個具體的理論架構是俱足的，是一個透徹的、完成了的完整架構，是教條的僵死作法，是跟不上時代的腳步的，是理性主義的「夢幻」。這種理論架構和架構內的一些概念，是天生帶批判性和被批判性的。批判性的理論架構和概念因環境而改變不合時宜之處，而批判性理論架構和概念本身也一定是要受環境改變的。²⁸

換句話說，在各時代中要一再做無數次的批判整合工作。這種「無數次的批判整合工作」，本身正是一種理論架構所隱含不彰的另一種「時代性的缺陷」（它是「當代的缺陷」）。有這樣的批判和翻新，才能促使一個理論架構和概念時刻向前發展與進步，具有時代的適當性。承認理論架構和概念永遠有時代性的缺陷，不是理論架構和概念有問題，它們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沒有讓它們經常往俱足（這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任務）、常新的方向走。這裡的理解，就像恩格斯談到作為理論結論的「辯證法」這一認識上所歸結的結論：「歷史卻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進程歸根到底是多麼的辯證，辯證法往往還是要等待歷史很久。」²⁹承認理論架構和概念永遠有時代性的缺陷，這應該是我們任何一個時代的人認真、嚴謹地對待理論的一種態度。

肆、拉克勞和莫菲的傳承

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雖然有我們上述評論過的問題，但他的「接合的方法」的洞見，的確開啓了通往「把源自不同理論系統的概念、假設和解釋原則結合起來，讓它們跟一定的、在理論上說明的要解釋的事件聯繫起來」之路，建構大型的、具體的理論架構的視野。繼起的拉克勞和莫菲自然知道他們老師的成就和問題，因此兩人將老師的問題去蕪存菁，予以重整。他們重整的方向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圓融傑索普關於理論接近現實的問題；其次是把「接合的方法」運用於建構社會總體裡面有關「政治面」（the political）的理論。

拉克勞和莫菲圓融傑索普關於理論接近現實的問題，說明關於理論接近現實的「認識」的場合，是在跟格拉斯（Norman Geras）論戰的地方。這也是他們把傑索普關

註²⁸ 我這裡的觀念是來自馬克思。見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頁4，馬克思在那裡寫道：「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註²⁹ 恩格斯，前揭書，頁84。

於理論接近現實的論點圓融得最清楚的地方。格拉斯懷疑拉克勞和莫菲在**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裡，是否真的是「超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⑩拉克勞和莫菲不到半年，立即在同一本理論刊物**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回應格拉斯，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是「不必認錯的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⑪他們詳細地提出了關於現實的「認識」。

拉克勞和莫菲篤定地認為，自然的事實也是言說的事實。因為關於自然的這種思想不是已經擺在那裡的某些東西，可以從東西的表象解讀得出來的。自然本身是一種緩慢的、複雜的歷史和社會構築的結果。「稱呼某些東西是一種自然的客體，是一種認知的方式，它取決於一套分類系統。」^⑫拉克勞和莫菲舉石頭和木頭為例，說明石頭和木頭都是人類在地球上給予它們的稱呼，如果沒有人類存在，儘管它們仍然存在，但它們就無以為「名」。所以在我們跟世界交往當中，客體從來都不是作為單純的存在實體賦與我們的，「它們總是在言說（discourse）^⑬的接合裡頭賦與我們的」。可以說，在任何言說環境之外，客體都不具有存在物（being），它們只有存在（existence）。^⑭

至於言說、言說的客體和現實的存在，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是否具有妥當性？拉克勞和莫菲以為，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說，任何客體的存在物—在從存在區分開來的時候—都是在一種言說裡頭被構築起來的，那麼就沒有可能按照存

註⑩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3 (May/June 1987), pp. 40~82. 同樣的文章，出現在下列場合：Norman Geras, *Discourses of Extremity: Radical Ethics & Post-Marxist Extravagances* (London: Verso, 1990), pp. 61~125.

註⑪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6 (Nov./Dec. 1987), pp. 79~106. 同樣的文章，出現在下列場合：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Press, 1990), pp. 97~132；這場論戰並沒有就此攔住。同樣，不到半年，格拉斯又補了一篇文章回敬。見 Norman Geras,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in *New Left Review*, No. 169 (May/June 1988)。同樣的文章，出現在下列場合：Norman Geras, *Discourses of Extremity: Radical Ethics & Post-Marxist Extravagances* (London: Verso Press, 1990), pp. 127~168.

註⑫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p. 84;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 102.

註⑬ 「言說」的概念，拉克勞和莫菲在他們的思想裡有特別的用法。按照他們的說法，言說是「從接合的實踐產生的那個被建構起來的總體」，談「言說的形態」（the formation of discourse）既是談精神和物質的統一，也是談把現實中的不一致、差異等等，在社會實踐裡暫時統一起來、暫時讓它們一致起來的社會情況。關於這些思想內容，請見拉克勞和莫菲，前揭書，頁142~155。

註⑭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pp. 85, 89;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p. 104, 109. 拉克勞在早期的言談中不是這樣談現實和概念之間的問題的，惟結論是異曲同工。相關的談法，見 Ernesto Laclau, "Building a New Left,"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Press, 1990), pp. 182~183, 185. 相關的討論，請見 Jessop, *State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289~296.

在物把推論 (the discursive) 從現實的任何其他領域區分開來。因而推論不是 (當然, 雖然具體的言說是) 其他客體當中的一個客體, 而是一種理論的層次。因此有關言說這個觀念的某些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它們只能夠在有關一種層次裡頭的客體時才能提出來, 而非關這個層次本身。」^⑤只要言說與客體的存在物是相連接在一起, 有關言說存在物的可能性條件這個問題, 就是沒有意義。

由於拉克勞和莫菲以為, 他們在理論上能夠圓融地說明有關傑索普的理論接近現實的問題, 所以他們原先運用「接合的方法」在架構政治活動的理論, 即有關「文化霸權」的邏輯時, 即做得理直氣壯。這是他們傳承傑索普關於「接合的方法」的貢獻, 而且是把它應用在社會總體的「政治面」, 來重整其他人的理論, 以建構國家理論的一個面向。

拉克勞和莫菲在理論上說明他們建構「文化霸權」的邏輯, 用意是在「填補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分析的基本概念」。^⑥他們的分析整合了有關的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被他們列入理論整合對象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 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考茨基 (Karl Kautsky)、普列漢諾夫 (George Plekhanov)、列寧 (Vladimir Lenin)、鮑威爾 (Otto Bauer)、索列爾 (Georges Sorel)、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和葛蘭西等人。拉克勞和莫菲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架構出發, 逐一解構這些馬克思主義派別理論、概念和詞語裡面存在的問題, 以及他們發人深省的一面。然後整合他們的「病因」和成就, 提出反省, 依次按照拉克勞和莫菲自己的問題設定, 建構從這些反省內容得出的理論結論, 制訂他們自己的概念內容和理論架構, 以具體的理論成就, 發揚他們老師的「接合的方法」。

拉克勞和莫菲利用馬克思主義各派別的理論, 運用「接合的方法」來建構他們自己政治行動的理論, 方式主要從三方面下手: 一、取得過去開發新理論的啓示; 二、研究過去理論困境呈現的問題; 三、批判整理過去整合理論的努力, 以取得自己理論建構的問題設定的妥當性。

一、取得過去開發新理論的啓示: 這項啓示主要得益於羅莎·盧森堡。拉克勞和莫菲從反省羅莎·盧森堡的理論思想看到, 如果不要相信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 同時不要依賴政治主體的階級性質, 那麼就能夠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可觀察到的趨勢取得政治結論, 社會主義「眼前的光景就完全不是幻想了」。^⑦這是拉克勞和莫菲能夠開始按照自己的問題設定, 建構政治活動的理論架構的出發點。

二、研究過去理論困境呈現的問題: 拉克勞和莫菲兩人自己問題設定的養份, 是從他們以反向思考的方式, 從反省思考他們所反省的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思想問題那裡取得的。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派別, 主要代表人物例如: 考茨基、普列漢諾夫、鮑威爾

註^⑤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p. 86; Laclau and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p. 105.

註^⑥ 拉克勞和莫菲, 前揭書, 頁 182。完整的說明, 見同前揭書, 頁 7。

註^⑦ 同前揭書, 頁 19。

和索列爾等，他們主要的問題在於反省「歷史的必然規律」、「不平衡的聯合發展」和「工人階級的統一性」等理論時，沒有辦法在理論上解決「接合」的問題。拉克勞和莫菲從他們那裡取得下列的問題設定養份：

首先，社會一致（統一體）的形成是在社會多元的和複雜的情況下產生的，所以社會面的不固定性成爲每一種社會一致的條件。^③否則就不可能有政治實踐的接合。而這種社會多元的和複雜的情況，使得政治活動的主體和階級的主體不再可能有必然的聯繫。在政治活動的接合必須從每一個社會組成成份的外部來進行時，這種接合的聯繫就「必須反過來按照新的理論範疇來說明」。其次，在社會面的不固定性中產生作用的政治主體性領域裡可以看到，當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社會當事人的立場之間沒有邏輯上和必然的關係時，就能夠站在一個與工人的需求一致的相同立足點上，把各式各樣的其他分裂點和民主的對抗點接合到一個社會主義的「集體意志」中。^④同樣的，在新時代的「新的社會運動」中發動一次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也不可能主張有政治實踐特權的階級。自然，在社會面的不固定性中，每一種社會組成成份、每一種「新的社會運動」本身的一致，也是經過接合的實踐後才產生出來的。在每一種社會組成成份、每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內部，處在社會複雜的和多元的情況中，不能先驗地肯定它們各別的「固定」形式。因而，社會面的接合實踐是「多元決定的」。^⑤第三，作爲接合實踐的「文化霸權」，不但在社會面多元的和複雜的情況下，把各式各樣的其他分裂點和民主的對抗點接合到一個社會主義的「集體意志」中，形成「社會一致」。它也同時「改變了執行文化霸權主體的一致」，讓它們分散到社會面的各組成成份裡。這種「集體意志」的社會一致，對於各實踐主體內部而言是它們本身的「不一致」。於是，通過接合實踐產生的一致，變成「暫時的固定」。這是文化霸權概念固有的緊張性。^⑥

三、批判整理過去整合理論的努力，以取得自己理論建構的問題設定的妥當性：拉克勞和莫菲從上述批判反省各家理論後「辛苦推出的新政治邏輯」，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即它具有的「妥當性」。與拉克勞和莫菲一樣，能夠反省過去理論所產生的問題，針對過去政治行動的困境做出反省，而提出接合實踐的理論的人，對拉克勞和莫菲而言，只有三個人。這三個人就是托洛茨基、列寧和葛蘭西。而拉克勞和莫菲從這三人的理論反省看到，不要受限於「階級聯盟」的想法，把社會面的各種異質性接合起來，就可以取得「新政治邏輯」的妥當性。托洛茨基、列寧和葛蘭西都這樣做過，只是他們做得不徹底而已。

經過上面這樣的整合和反省，拉克勞和莫菲終於能夠利用他們老師的「接合的方法」，建立起他們關於社會總體裡頭的「政治面」的理論。這個理論邏輯並不複雜。它首先主張，社會面是一個變動不居、不固定的、含有差異體系在內、非縫合的總體。

註^③ 同上註，頁 116。

註^④ 同上註，頁 116~117。

註^⑤ 同上註，頁 118。

註^⑥ 同上註，頁 118~119。



這些在社會面內部存在的差異體系，即為社會面的組成成份。沒有這些屬於差異的組成成份，政治實踐（即接合）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在組成成份內部建立一種關係的任何實踐，即是接合。接合的實踐建立起組成成份暫時的一致（即環節，moments），也把原來的組成成份的一致修改過了。從接合的實踐產生的被建構起來的總體，即為言說。所以言說的這個總體就是含有環節的體系。但是這種體系，「只有作為暗中破壞體系的那種『意義的一種累贅』的部份限制，才能存在」，所以「一個言說的總體從來都不存在於完全是現有的和有界線的肯定性中，這種有關聯的邏輯就是不完全的，就會被偶然性質貫穿。從『組成成份』到『環節』的這項過渡，從來都不曾完全實現過。」^②

把這種社會邏輯套在文化霸權的理論說明上面，就是這樣：「文化霸權出現的一般領域是接合實踐的領域，這是說，一個『組成成份』不是體現成為『環節』的領域。」把「有關聯的一致組織起來的辦法，相對地把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空間統一起來，這就是葛蘭西所謂的歷史性集團。把不同歷史集團的不同組成成份聯結起來的這種聯繫……是跟……關於言說形態的概念一致的。」^③

拉克勞和莫菲利用他們老師的「接合的方法」，建構起「文化霸權」的政治面理論，花的功夫很深，而且也做得有模有樣。這是值得我們學習。但是他們的理論依然沒有脫開他們老師的問題，即：還是沒有把「具體的現實」擺在眼前。拉克勞和莫菲的政治活動的理論雖然是從具體的現實中得出來的理論反省，但問題是一個社會現實作為總體，它有許多的面向，例如政治面、社會面、倫理面、經濟面或意識形態面等等。不能夠以一個有關過去現實的政治面的分析，來概括和代替其他社會面向的分析。尤其是對於要加以改變的當下社會現實各個層面，一定要落實分析，因為它們之間都是相連的。解決和說明政治面的問題，其他層面的問題依然存在。它們會如傳染病一樣，把問題再丟回已解決問題的領域。所以重點還是要按「接合的方法」，從其他人的思想那裡接合、生產跟政治面也相關的那些關於現實其他層面的理論，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說明這些聯繫，解決它們之間存在的、會產生緊張關係的問題。

理所當然地，拉克勞和莫菲和他們的老師一樣，不理會在現實裡存活著的現實的客體，他們的現實的客體只存活在他們言說的空間裡。它們沒有具體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也沒有發展，所以它們並不是活在地球上。只要昨天的石頭和木頭是那樣，那麼在言說的領域裡，它們永遠「宛如昨日」，完好無缺。這樣一來，在現實中一如在言說中，反之亦然（因為，言說的事實就是自然的事實），言說和現實都是封閉的、統一的、固定的和確定的（在這裡，還無需談到言說所概括的客體是否跟現實有任何的關聯這一問題），就跟他們的社會邏輯是相反的。這種從邏輯得出來的結論有兩個後果，一則不但有違現實情況，還背離拉克勞和莫菲理論的初衷，即要從社會是開放的、非封閉的裡頭，「擠壓」出政治活動的邏輯；二則在這種理論的言說中久了，最後可

註② 同上註，頁150，149。

註③ 同上註，頁181，182。



能會錯誤地認為光談理論，不管現實的變幻，和是否對癥下藥，就能解決現實的問題。霍華（Dick Howard）在說明政治面（*Defining the Political*）裡頭，說他們兩人努力為再明白不過的現代社會進行重建政治理論的工作，卻成爲一個未經考察過的前提，即「社會面」的第一性的犧牲品；他們講了老半天的政治活動，其中心概念重點卻一點都沒有說到「政治面」；「他們進行文化霸權的政治活動，可是被卡死在社會面裡頭」。^④霍華會這樣說他們兩人，不是沒有理由。

不用說，這非拉克勞和莫菲所願見到的後果。但他們終究迷失在關於言說的客體裡，竟然套用語言學和結構主義關於語言和結構總體的說法，企圖超脫他們的理論困境。按照他們邏輯推理的特權，言說的事實就是自然的事實，這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他們以爲，在言談中建立起來的不同立場之體系，跟把它們聯繫起來的語言學之外的和推論之外的行動之間，是不存在任何基本的差異的。那麼因爲沒有差異，就能夠正當地把語言學的分析，擴展到言說的整個領域。^⑤他們的推理很單純，但作法很主觀。

伍、第三代的努力

套用傑索普的接合的方法，在理論建構上小有成就的第三代就是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他們的理論成果發表在合著的**國家、經濟和社會**之中。他們利用概括三個不同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即管理理論（regulation theory）、戰略聯繫分析（strategic-relational analysis）和言說分析的管道，提出可供分析國家、經濟和社會的一個符合當代需求的理論架構，或者發展出一套透徹的有關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思考角度。他們的方法很簡單。爲了不想引發一堆理論問題，對於老問題，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暫時的和開放性的解決方法；他們強調，需要對三種不同的現代馬克思主義傳統所發展的中等程度（meso-level）（介於宏觀及微觀之間）的概念，做一種實用性的結合。這種實用性的結合，會讓人看起來好像是功利主義的作法。爲了怕引起別人誤會，針對這一點，他們特別加以解釋。他們說，這種實用性的結合，並非要表現「什麼東西都可以用」的理論之混亂狀態，而是要「批判地發展這三個思考角度」，最後達成上述的目標，即「發展出一套透徹的有關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思考角度」。^⑥

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接合前人理論和概念的觀念不錯，只可惜他們的方法和對於問題的提法不對。他們所仰賴的不是當下社會現實的基礎，而是「政治活動的第一性」（the primacy of politics）這一「抽象」的概念。^⑦他們把「政治活動的第

註④ Dick Howard, *Defining the Politica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pp. 93, 96.

註⑤ 請見 Jessop, *State Theory*, p. 289.

註⑥ Jessop, "Foreword," pp. xxviii~xxix.

註⑦ Bertramsen, Thomsen and Torfing,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xxxi, 6~7, 19, 24~33, 37, 92, 143, 153, 159, 196~7.

一性」的概念，當作整理和整合不同門派理論的組織原則，當作縫合（suture）^④不同的理論對象、理論領域，讓它們能夠結合起來的針線。他們的方法完全是靠理論的言說進行的。他們對於問題的提法，完全是從批判前人的理論漏洞著手的。因此靠批判的邏輯生出批判的果實（這就是他們的接合內容），即他們的理論架構。他們的工作方法除了他們的老師傑索普外，也有其他的理論先驅，如前面曾經談論過的興達斯、希爾斯特、庫特勒和休塞恩等人。

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如何靠「政治活動的第一性」這個「理論的言說」概念，整理和接合不同門派理論，說明他們所要討論的現實呢？爲了怕落入古典思想中思想與現實之間區分的牢籠，爲了不想被纏繞在知識如何占有現實，或者是與現實發生對映關係的這些問題上，他們是不涉及認識論和知識論的。但他們承認有一個外在的現實，即社會。這個社會，「沒有本質」。^⑤也直接認定，社會面是開放性的、不一致的、非同一的，是變動的、非固定性的。^⑥至於如何取得社會「沒有本質」的看法，來源並非來自於「社會」這個客體、這個對象。因爲社會還不是言說的一個妥當的對象。他們靠的是論證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之不妥當，指出它在論證讓社會每天都能維繫下去這裡頭占重要地位的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活動中，未給政治活動一個位置。由於認定這種政治活動的缺乏，就足以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封閉的、具有中心的總體」，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這樣保證了社會關係的再生產。^⑦至於古典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如何看待政治活動？他們以爲，它「總是把政治活動的邏輯歸屬於一般資本的邏輯。」因此，政治介入被看成是打斷而非修改揭示出來的資本邏輯的這些歷史的偶然性。「結果，它們不是被拋棄，就是被當作未經過理論說明、而用來作爲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補充。」^⑧

在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的想法裡，把社會看成封閉的、具有中心的總體是有後果的。他們認爲，應該把「社會形態當成是被接合起來的開放性有聯繫的總

註④ 這裡用「縫合」這個概念是有特殊意義的。關於「縫合」在這裡的意義，見下列研究：Kaja Silverman, "Suture," in Philip Rosen, ed., *Narrative, Apparatus, Ideology: A Film Theory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9~221; Kaja Silverman,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94~236; 拉克勞和莫菲，前揭書，頁119~1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 88; Jacques-alain Miller, "Suture Elements of the Logics of the Signifier,"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pp. 24~34; Stephen Heath, "Notes on Suture," *Screen*, Vol. 18, No. 4 (Winter 1977/1978), pp. 55~56.

註⑤ Jacob Torfing, "A Hegemony Approach to Capitalist Regulation," in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p. 50. 他們的觀點與拉克勞和莫菲是一樣的。請比較他們的看法，見拉克勞和莫菲，前揭書，頁130~131;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p. 96.

註⑥ 請比較下列說法：拉克勞和莫菲，前揭書，頁150~151;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pp. 111~112.

註⑦ Bertramsen, Thomsen and Torfing, "From the Problems of Marxism to Primacy of Politics," in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7~18.

註⑧ *Ibid.*, p. 17.

體」。這是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論證社會面是開放性的、不一致的、非同一的，是變動的、非固定性的理論來源。那麼如何取得縫合各家理論的思想針線？靠的還是社會「沒有本質」的看法。

假如容許把社會形態當成是經常受到組合的外在所顛覆的一種開放性有聯繫的總體，那麼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必然就採取社會關係的反接合和再接合這種複雜過程的形式。^⑤社會關係的反接合和再接合，即是政治活動。「社會面」這個不穩定、非固定性的總體，總是要靠反接合或再接合活動，才能成就為總體。按照這種邏輯推理，在非封閉性的社會面裡，「政治活動的第一性」這個「理論的言說」可以出現在這個場合，這個縫合各家理論的思想針線，就取得了它的正當性。

但面對現實的、非理論說明裡的「社會」，究竟「政治活動的第一性」的「理論的言說」有沒有現實性，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並未予以討論。不過他們認定理論的論證，或依他們的說法，理論的「言說」，就是現實。

首先，他們認為，社會面總是有某些東西，也就是總是以某種方式而非另一種方式建構起來的。這就是含有政治活動，含有政治面的東西。但是因為社會當事人在社會面日復一日的實踐裡被制度化和例行公事化了，社會面的東西就沈澱下來，政治面被淡忘了。現在要使政治面重新活動起來。^⑥目前的問題在於：理論上說明的和現實中的重新激活，是否為一體之兩面。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對於這點，都沒有遲疑。他們認為言說的分析就是現實的分析。因為，「言說毋寧是與社會面共長久的」。^⑦他們以為，能夠把言說的形態看成是一群具體的言說，說它們是經過在社會對立的背景中發生的文化霸權實踐所形成的和改造的。所以三個不同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即管理理論、戰略聯繫分析和言說分析，經過「理論的言說」的接合，也就能形成分析國家、經濟和社會的一個符合當代需求的理論架構，而且這個理論架構就是有關現實的一套完整、透徹的表述。

我們仍然要小心。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所說的「言說的分析就是現實的分析」，其中的「現實」絕對不是我們所談的「當下的現實」，或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或者經過理論生產的加工過程從知識裡取得的認識。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從不否認，世界不是由人的精神所構築起來的，意識之外有一個實際的存在。而他們的理論的言說所談的「客體」，根本就不是現存世界的「物質」，而是言說的對象，言說的自己單獨具有的客體。按照他們的說法，這些言說的客體，「從來都不是以物質的方式賦予我們的，而總是以在種種層次的意義裡頭被接合起來的形式的形式賦予我們的。」^⑧說白了，言說的客體就是把有別於現在要批判說明別人的這個言說的「其他言說」，一起接合起來的東西。說穿了，言說的客體也不是傳統認識論所

註⑤ *Ibid.*, pp. 16~19

註⑥ *Ibid.*, pp. 29~30. 積淀和重新激活之間區分的說明，請見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Press, 1990), pp. 35~37.

註⑦ Bertramsen, Thomsen and Torfing, "From the Problems of Marxism to Primacy of Politics," p. 33.

註⑧ Torfing, *op. cit.*, p. 52.

理解的言說的客體，而根本就是這個言說所接合的別的一些言說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形式」。自然地，「客體的這個形式是跟現存的物質不同」。^⑤

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卻遠比他們的老師還超脫。他們認為，以言說身份出現的「形式」，和「物質」在哲學上是有差別的。「物質涉及現實、現存的實體，而形式涉及能夠粘貼在物質上面的種種特質。」惟形式非從物質那裡取得的。^⑥他們大約也發覺到拉克勞和莫菲拿來概括現實客體的「言說」，身份來歷不明。他們靠解構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賜與他們的政治行動符咒。

德希達從研究「美國獨立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建立起一套暴力的行動哲學。^⑦德希達認為，在宣佈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共和國的行動中，可以找得到的問題就是那些有關任何建立制度設施的語言的問題。問題跟時間有關。宣佈美國獨立，是通過簽署獨立宣言。該共和國的宣言直接代表人民的意志先於宣佈的這一行動，不過這個意志還只是通過這個行動才被創造出來。可是美利堅合眾國畢竟還不是一個事實。不是一個事實這件事，表明創造的這個環節和成為事實這個環節，在時間上有差距，事實要被延宕到以後來完成，而創造這個環節不過是「暫時的」性質。換句話說，創造這個環節和事實這個環節沒接得上，是時間接不上（disjointure）。這樣一來，「把美國創造出來就必定是暴力的，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先前的法律 and 國家能證明它是正當的。」^⑧所有的創造都得事後才能得到承認，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此為道理所在。所以要努力讓「先於未來」的這一運動，即創造，通過力量，通過「先於未來和未來」之間的接合，表現成為「現在是不適合本身」，因而要改變的跡象（trace）。「先於未來和未來」、「創造和事實」等等，靠接合與結合來成就，「和」就是上帝，「接合」不過是上帝的「三位一體」其中的一體。德希達如是說：「『實然和應然』；『和』在這裡接合並結合兩種言說的模式，即存在和應該、觀察和描述、事實和應該（*le fait et le droit*）。和就是上帝。」^⑨

承認「現在是不適合本身」，要創造一個事實，是一個「不可能的經驗」。但這個「不可能」，不是任務的不可能，而是「當下」的不可能性質。我們面臨這個「當下」，這個「不可能」表示我們不可能把時間擠到一個現在上面來，把「先於未來」和「未來」壓縮到一塊去。「當下」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表明，時間接不上，先於未來接不上未來。但這種承認，不是我們一定要承認時間。而是說，承認「當下」創造的那個情況，重新認識時間，就可以用政治活動來轉變政治活動和時間的關係。^⑩

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玩的就是德希達在這裡所講的「延宕」的政治行動

註⑤ *Ibid.*, p. 52.

註⑥ Bertramsen, Thomsen and Torfing, “From the Problems of Marxism to Primacy of Politics,” p. 28.

註⑦ 這裡有關德希達的理論解說，都是參考比爾德斯華斯（Richard Beardsworth）的研究成果。請參考 Richard Beardsworth, *Derrida &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6), pp. 98~104.

註⑧ *Ibid.*, p. 99.

註⑨ *Ibid.*, p. 100. 德希達這段話的原始出處，見 Jacques Derrida, “Déclarations d’indépendance,” in *Otobiographies: L’enseignement de Nietzsche et la politique de nom propre* (Paris: Galilée, 1984), p. 28.

註⑩ Beardsworth, *op. cit.*, pp. 101~102.

符咒，惟他們運用的德希達在另一本早期著作《言談和現象》（*Speech and Phenomenon*）裡的思想。不管唯心主義者或者唯物主義者在認論論上怎麼看現實，他們都是把作為認識表現出來的「形式」（即概念或者範疇），看作是保證認識可能性、完全占有現實的一種「完全俱足」（full presence）的「形式」。那麼這裡靠緊德希達對於西方有關「俱足」的這種形而上學所做的破壞性的批判，就有可能給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有關「言說」遇到的難題解套。^⑥德希達解題的方法是這樣：^⑦

我們只能夠在「完全俱足」是和「原來沒有」的對立中，來思考「完全俱足」。有關「當下」（先於未來）的純粹性，全是通過在構築上提到「非當下」（未來）拼湊起來的。「當下」本來就是「原來沒有」；「完全俱足」的「非當下」是「當下」「現在是不適合本身」的跡象。「非當下」是目前提出來說明，是優先於「當下」的「後來者」。「當下」未能夠成爲「非當下」這個本身統一「完全俱足」的統一體，是因爲時間上有「差距」，時間上「延宕」了。

這裡的譬喻很明顯，「當下」和「非當下」彼此間成就了可能性的條件。「當下」就是代表當下的現實，即「物質」；「非當下」就是代表時間上被延宕的「未來」，即「形式」。這兩者之間，就被思考成爲互相規定彼此統一體的不同環節中的相關聯總體。既是如此，「物質」和「形式」之間的相關聯的關係，就是按照「接合」來思考的。接合是一種實踐，爲成就「完全俱足」的「未來」，事實上就不足以排除「物質」被它的「形式」吸附進去。「形式」在這裡表現出具有構築和顛覆的外在性質。換句話說，「形式」作爲言說，要成爲延宕（非當下）和差距（非這個）的合題，成爲貫徹「欲望」和「意志」，以消滅、淬煉「延宕」和「差距」的這一接合的實踐。^⑧通過武力勉強的手段，讓「現實」趨向「形式」，根本無需論證「形式」和「現實」是否對映問題，「形式」占有「現實」這點，因之不形成問題。

可是，縱然「形式」占有了「現實」，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還是沒有交待「形式」從哪裡來。自然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論證，從邏輯觀點推論出，他們根本可以不必管這個問題。既然「形式涉及能夠粘貼在物質上面的種種特質」，「形式」可以硬扣在「物質」上面，讓「現實」趨向「形式」，「形式」從哪裡來的即變成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成就讓「現實」趨向「形式」的這種可能性情況。我們可以从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的說法，得到這點的佐證。

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認爲，等到有一種觀點達到普遍的程度，我們就會

註⑥ 德希達在這本作品裡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見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on* (New York: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9~143. 有關德希達在這本作品裡相關思想的討論，亦請見Rodolphe Gasché, *The Tain of the Mirror: 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4~205.

註⑦ 這裡所做的說明，不是爲給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在理論上圓融用的，我倒確實實是用他們自己的說明來解釋他們如何爲他們自己解套。可能有極小部份的補充說明是我自己的，不過這也是爲了讓他們的說明更能夠讓人體會的緣故才做的說明。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的說明，請見Torring, *op. cit.*, p. 54.

註⑧ *Ibid.*, pp. 54~56; Gasché, *op. cit.*, p. 196.

有一種浮現出來的言說，成功地封鎖有關另一種言說真理的政權。這就成就「現實」趨向「形式」的這種可能性情況。「在這裡關鍵的地方是要注意，科學言說的主宰地位不是從它跟現實的對映一如它確實那樣的這種論斷而來；一種特定言說的主宰地位，是基於仍然還存在著的其他言說能夠質疑的一些歷史情況。」^⑥所以談論形式從何而來，肯定是沒有旨趣的。

從這裡可以看到，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不是研究我們當下的現實。雖然在他們的論證裡，可以努力讓當下現實按照他們的接合實踐，變成他們所要的「未來」。所以他們可以通過把當下現實全部顛覆，重來換新的方式，不必探討當下現實出現何種狀況，要從何著手。這樣理論研究的壓力減輕一些，問題也減少很多。但他們的接合方法仍引人疑惑。他們的接合方法僅僅重視接合的問題，而輕忽他們的接合方法可能引發的暴力疑雲。還有，他們的接合方法是否真正的說明了現實問題，解決了現實問題，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他們不像拉克勞和莫菲兩人，這兩人基本上還對所謂「激進的民主」、「多元的民主」著墨甚多。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的接合方法根本就不管，我們在研究理論工作時特別要注意，他們的接合方法會不會產生以暴易暴的問題，也是我們要改變他們對於問題提法的一個間接的原因。而恰恰是這一項間接隱含著的問題，跟他們把「政治活動的第一性」當作他們整理和整合不同門派理論的組織原則，當作縫合不同的理論對象、理論領域，作為結合起來的針線的這項工作方法，是相互對應著的。

陸、接合的方法在理論上的啟示

傑索普派的接合的方法在理論建構上的貢獻顯然非凡，上述的分析顯示，只要把這一派不重視具體現實的問題經過理論加工整理，他們在理論上的啟示就不是在一兩方面了。運用接合的方法所取得的理論認識，即可重新建構有關社會總體的理論架構，從這裡再面向具體的現實，具體社會的光景即非我們一般傳統所理解的東西。而這點對於政治行動或社會改造來說，意義即不同。對於國家理論層面來說，運用他們的理論啟示進行理論加工所生產出來的理論知識，即可以架構出一個理論體系的藍圖，而且可以重新提出幾個命題，協助我們理解國家問題這個課題。以下就試著從傑索普派的理論啟示生產出來的理論知識體系，描繪出關於國家現實的理論架構藍圖。

按照現實的出發點，總體永遠都不會是一個總體。不管是從時間或者空間來說，總體都是一個分散（de-center）的結構。總體總是觀念上的譬喻，它形容一個事物狀態，可能是精神上的完美俱足、情況的概括，或未來奮鬥的目標，^⑦可是不管怎麼說，

註⑥ Torfing, *op. cit.*, p. 57.

註⑦ 有關的討論，包括總體性觀點的歷史分析，請見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21~80. 有關個別理論家的看法，請參考 *Ibid.*, pp. 81~537; 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 *Marxism and Socialist Theor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1981), pp. 52~65; Robert Albritton, *Dialectics and Deconstruc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 23~25, 71~76, 145~147.

在現實中不會有固定的、完美的、定形的總體這個東西。總體在現實中總是處於不定形的流動狀態中，有一部份屬於此時此地的內容，有一部份屬於彼時彼刻的內容，又有一部份於既是彼也非彼的內容，更有一部份屬於既是此又非此的內容。它不是一個「結合起來的構造」。我們稱呼一個現實為總體，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正如同我們用一個概念形容一個東西，或者一個狀態一樣。只是為了邏輯上分析方便而已。我們在現實中絕對不能忘記，它們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正如同卡斯托里阿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說，如果系統都有保存它的「狀態」和它的「變動」能力，那麼就永遠不會有像一種活生生的存在物這種東西；而且如果說通過某種奧秘，只曾經有過那麼一個東西，那麼曾經就只有一個東西。^⑧

我們描繪具體現實的藍圖是總體，這個總體在具體的現實裡既然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那就是在內部中有不和諧的組成成份來組成它。在我們的問題設定裡，這些組成成份也一樣不會是和諧的統一體。道理和上述相同。它們全部就個別部份來說，都各自形成一個獨立的小的總體。它們與大的總體的關係，它們相互之間的彼此關係，既是獨立自主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但它們跟大的總體的關係，相互之間是暫時的融合的關係，即像阿圖塞所講的，各種矛盾（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會「匯合」成爲革命爆發的統一體。^⑨至於什麼時候融合破裂或者革命爆發，就要視情況而定。^⑩同理，各組成成份內部構成爲總體的性質也是一樣。

所謂的總體，是我們在邏輯上去除特殊性的分析。放到具體的現實裡頭，所謂的大總體，第一個浮現在我們心頭的就是社會。社會猶如任何其他實體一樣，是存在於時間和空間裡，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持續性質，沒有結尾，沒有休止符，當然更沒有起源。就時間來看，社會正如同（這是譬喻的說法）並列的一系列結構，好像是從頭到尾排列著。因之，每個不同時代的社會的銜接，彷彿形成了歷史。但就不同時代的每個社會而言，也非沒有時間性的呆滯並列著。^⑪就空間來看，社會正如同（這是譬喻的說法）散置的一大堆體系，星棋羅佈地鋪滿著。因之，每個不同特性的社會的差異，形成了族群。但就是不同特性的每個社會而言，也非沒有空間性的殘餘存在著。^⑫所以處在時間裡的社會，不會是單線、片面發展著；所以處在空間裡的社會，

註⑧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p. 216~217.

註⑨ 阿圖塞，前揭書，頁 109。

註⑩ 阿圖塞的複雜的結構整體，其內部矛盾互爲條件，這種條件的情況並不構成整體和其統一體的這一複雜性的支配結構產生破壞。而且阿圖塞的結構整體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經濟的發展狀況。因此雖說阿圖塞還提階級鬥爭等政治活動，但是他的理論提法仍陷於不切實際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窠臼中，使合乎現實的許多有關反制活動的理論範疇無法提得出來。阿圖塞的問題設定產生的後果，我們後面會再提到。阿圖塞關於複雜的結構整體的提法，請見同前揭書，頁 233~236。

註⑪ Castoriadis, *op. cit.*, p. 216. 這裡談的「呆滯」是講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而言。關於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相關研究，可參考 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註⑫ 見阿圖塞，前揭書，頁 125~127。這裡談的「殘餘」，其實就是舊社會的「餘毒」的意思。阿圖塞在前述的著作裡有精彩的分析。

也不會是壁壘分明。這樣可以理解得到，從空間來看的社會有時間侵蝕著，從時間來看的社會有空間瓜分著。社會處在時間和空間的張力中，而且是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張力中。社會能作為統一體，僅僅是暫時的融合。既是巧合，也是奇蹟。社會沒有本質，也從來沒有結構。

這樣看來，無論是從概念上或從術語上來說，還是從具體現實上來說，社會都不能永遠是社會，社會不會有本質。^③既然社會都不能永遠是社會，社會非但不能夠界定，可能還需要不同的概念來表明籠統地在「社會」術語下概括的那個社會。

命題一：如果我們把暫時融合的社會看成一個立體的空間，就大的社會、社會內部的組成成份，以及各社會內部的組成成份的那些組成成份等等而言，它們內部的不同面向，其中「社會面」^④的組成成份會變成「政治面」的組成成份；「政治面」的組成成份會變成「經濟面」的組成成份；「經濟面」的組成成份會變成「社會面」的組成成份，它們彼此交織在一起。其他的層面依次類推。反之亦然。從現實的觀點來看，這些同一種組成成份的差異變化，正是一個總體處在活生生的狀態中的情況。這種不定形的、非封閉性的、不完美的總體，要用我們問題設定的提法來提，就是「社會面」既是又不是「政治面」，既是又不是「經濟面」；反過來的問題提法也一樣。它們根本是重疊的，而且是一體的三面表現，三位一體。其他層面亦同。至於如何提法才完全正確，合乎現實，就要看是從那一個時間和空間來提問題，而且只能限定提出時的條件。從這裡觀之，單獨、片面的社會理論、政治理論或經濟理論等等，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在於事實上的不能夠。^⑤

命題二：如果我們把暫時融合的社會當成一個樹狀結構，就樹狀結構的整體和各下層組織、各下層組織之間，以及各下層組織中的各組成成份之間的相互關係而言，它們之間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它們的不固定、不定形和非封閉的狀態，會因為相互之間產生有效作用的結果，在原來各組成成份的結構裡再產生打亂（dislocation）、替換、凝聚等等的連續效果出來。整體和各下層組織、各下層組織之間，以及各下層

註③ 這段話的意思，跟拉克勞、莫菲、貝特拉姆森、湯姆森和托爾芬等人所理解的意思是一樣的，但是對於問題的提法不同。這裡不是為了迎合「接合」的實踐，從邏輯上推論出來的。而是因為在經驗的具體現實裡，社會本來就有這種性質，否則社會根本就不會有到我們現代為止的發展和變化。這點確實不需要靠邏輯推論，只要按照事實來說明即可。

註④ 這裡術語的用法是跟拉克勞和莫菲在**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裡完全不同。拉克勞和莫菲把 society 和 the social 分別開來，含混地以概念表述方式指稱不同認識的「社會」，雖說在說明中有約略地解釋，但是完全沒有意義，它們只是表明兩種不同看問題的提法而已。拉克勞和莫菲的講法，請見 Ernesto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pp. 95~96. 對於他們術語用法的批評，請見 Jessop, *State Theory*, p. 289. 關於為什麼以定冠詞加形容詞的表述法來研究社會，理由可以參考下列研究：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註⑤ 從不同的問題提法取得相同的看法的研究，請參考 Adrian Leftwich, "Politics: People, Resources and Power," in Adrian Leftwich, ed., *What is Politics? The Activity and Its Stu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4), pp. 62~84.

組織中的各組成成份新的相互關係的統一體，仍然是暫時性的融合。而且，整體和各下層組織、各下層組織之間，以及各下層組織中的各組成成份新的相互關係中存在的力量對比，在具體的現實中顯然比想像中還要抽象。首先，它們不但會產生恩格斯所講的「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總的效果，^⑥還會在時間和空間中產生「加成」的作用。其有效作用是無法計算的。其次，在時間和空間過程中經歷打亂、替換、凝聚等等效果後的整體和各下層組織、各下層組織之間，以及各下層組織中的各組成成份之間彼此的相互關係，會是承認（recognition）、誤認（misrecognition）、順從和無奈（resignation）等等的關係。^⑦其有效作用的表現會是不可預見的、多種多樣的和多層面的，並且是交錯的，因此增加暫時性融合的整體非固定性、非封閉性錯綜複雜的程度，使其到達了無法估計的地步。

命題三：如果我們把暫時融合的社會看成為一個有上下層級對映的結構，首先在社會內部，社會和它內部的各組成成份之間、各組成成份和它內部的組成成份之間，一定充滿著虛假的對映表現。其次，整個社會一定到處都在社會本身、在其內部各個組成成份和各層的組成成份的內部等等的上層結構中，充滿著虛假的對映表現。這個虛假的對映表現是社會和它內部的各組成成份之間、各組成成份和它內部的組成成份之間、社會的上層結構和基礎之間、各層次的組成成份的上層結構和基礎之間等等存在著差異性的結果。但社會既然是暫時的融合，換句話說，融合的社會是隱藏著差異、不定形、非封閉性，才有虛假的對映表現。由於有這個虛假的對映表現，社會作為一個（固定的、封閉的）總體，就是以一個總體的身份出現，即為虛假的共同體。在這個虛假的共同體內部，各社會面即各政治面，各政治面即各經濟面，各經濟面即各社會面；其他層面亦同。因而社會等於政治，政治等於經濟，經濟等於社會，三位成為一體。這個社會在其內部就是有聯繫的（relational）。

在這個有聯繫的社會裡，為掩飾虛假的特殊利益，成就共同利益的虛幻面貌，社會裡頭的其中一個占著主導地位的「我」（私人的特殊利益），採取「我們」（公共利益）的姿態。其餘的非占著主導地位的「我」，被邊際化成為「非我們」。於是占著主導地位的「我」的社會，成為所有社會內部各組成成份共同的、虛假的「我們的社會」；社會面表現成為「我們的社會關係」（社會交往），經濟面表現成為「我們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政治面表現成為「我們的政治活動」（生活方式）。在

註⑥ 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頁459~462。

註⑦ 我轉用了下列研究成果的心得：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7~188; 阿圖塞著，杜章智譯，*列寧和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9年），頁151~213; Göran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State Apparatuses and State Power under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1980), pp. 171~175; 泰爾朋著，陳璋津譯，*政權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政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9年），頁95~113; Göran 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Press, 1980), pp. 93~112.

社會的層級結構中，用大廈的建築作表示位置 (topique) 的隱喻，^⑧生活的生產 (方式)，立即表現成爲「社會關係」；「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了國家的基礎」，^⑨這種社會組織組成了政治活動的形式，以政治面的方式表現出來，即國家。^⑩國家在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在維護現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採取一種和實際利益 (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 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採取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⑪

命題四：如果社會在具體現實中是一個不定形、非封閉的狀態，可是暫時融合的社會是以一個總體的身份出現，而且能夠以一個虛假的共同體的姿態出現，即使是暫時性的，顯然在其中有著接合或縫合作用的針線存在著，讓社會維繫著這個狀態。這條針線就是「意識形態」。在這裡，「意識形態」跟正確、錯誤或虛假意識無關，^⑫跟屬於哪一種性質或領域的思想也無關，^⑬跟是否屬於思想領域更無關。^⑭「意識形態」

註^⑧ 這裡是借用阿圖塞的措辭，請見阿圖塞，*列寧和哲學*，頁157。這是爲了分析邏輯的方便計所做的設想，也是爲了方便說明而已。但是做這種譬喻比沒有做這種譬喻，可能更糟糕，因爲這種譬喻引起了很多誤解。這裡能夠先說明的就是，這種譬喻是做了一種「作用」上的劃分功用而已，實際上現實社會不存在這種「空間」形式。相關的這類說明，請參考 Maurice Godelier, "The Ideal in the Real," in Raphael Samuel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 pp. 16ff.

註^⑨ 馬克思和恩格斯，前揭書，頁41。

註^⑩ 在這裡，「國家」和「政治面」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不同說法。這項爭議從古到今還在進行中，但這都是問題設定不清之故。這些討論，請參考 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89), pp. 57~69.

註^⑪ 馬克思和恩格斯，前揭書，頁37~38。

註^⑫ 把意識形態如是觀或做這樣的討論的例子，見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83), pp. 46~81; L. G. Graham,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D. J. Manning, ed., *The Form of Ideolog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0); Ron Eyerman,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1), pp. 12~42; Ernesto Laclau,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5, Nos. 1~2 & 3 (1991), pp. 24~27; Jorge Larra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79); Jorge Larrain,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註^⑬ 把意識形態如是觀或做這樣的討論的例子，見 John H. Westergaard and Henrietta Resler,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註^⑭ 把意識形態如是觀或做這樣的討論的例子，見 Nicholas Abercrombie,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 Turn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0), pp. 187~191; D. J. Manning, "The Place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Life," in *The Form of Ideology*, pp. 71~89; Anthony Giddens, "Four Theses on Ide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5, Nos. 1~2 & 3 (1991), pp. 21~24; Claude Lefort, "On the Genesis of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5, Nos. 1~2 & 3 (1991), pp. 46~86; György Márkus, "Concepts of Ideology in Marx,"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5, Nos. 1~2 & 3 (1991), pp. 87~106; Joe McCarney, *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0); Kenneth Thompson, *Beliefs and Ideology* (Sussex: Ellis Horwood Ltd., 1986);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93~407; Bhikhu Parekh,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2); Raymond Boudon, *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17~33.

就是讓社會能夠產生暫時融合作用的針線，它可能是屬於思想領域的東西（理論的實踐），也可能是屬於社會活動領域的東西（物質的實踐）。^⑤但無論如何，它產生了暫時融合的作用。

同樣的，在社會這個虛假的共同體裡頭，意識形態既然是以一種縫合的針線這一作用存在著，就整個作用概括範圍而言，意識形態是一個在現實中存在的共同的虛幻結構。意識形態與社會、社會內部的各組成成份、各組成成份內部等等，在具體現實裡必然沒有共同的邊界；它跟社會內部的社會面、政治面或經濟面等等，一樣必然沒有共同的邊界。所以也沒有「重疊」的問題。這裡的問題提法，更是暗暗地已經指明出來，不管是在社會內部，或者是在各組成成份之間，或者是在各組成成份內部，產生縫合的針線作用的意識形態，就不會只是單獨一種，它們可能是多種多樣的，數目和變形多到分類都無法盡其所能。在社會內部是如此，在社會內部的各組成成份之間是如此，在各組成成份內部更是如此。自然就各個意識形態的本身而言，它們都是暫時融合的整體。因而不管它們處在那一個位置的形勢中，都是非封閉性的、非固定性的，處在彼此相互競爭的鬥爭形態中。「它們不僅都是共存著、相互競爭和衝突著，而且也是相互重疊、影響和污染著」。^⑥可以說，意識形態是「仍在作用著的社會過程」，^⑦它們沒有終止形式的完成俱足形態。

命題五：政治活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由於社會以虛假的共同體形式存在著，政治活動的性質隱藏在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裡，為它們所掩飾。但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所隱藏的政治活動，不僅僅是隱藏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所主導的政治活動，它也隱藏非占主導地位的一些「特殊利益」所主導的政治活動，即使後者是遭到社會大環境的壓制、抵制或者威脅，或者遭到非占主導地位的一些「特殊利益」彼此的牽制、合作。這兩者、三者或者許多者的性質或許相反，但動機一樣的政治活動，是在社會總體裡競爭著本身特殊利益的展現機會。這些政治活動包含著妥協、合作、排擠、壓制、抵制、威脅、控制、禁制或消滅等等社會交往行爲。這些社會交往行爲，在社會總體的政治面裡頭，相應地產生了合法、正當、權力、社會一體、同意、權利和迫害等等的政治關係；在社會總體的經濟面裡頭，相應地產生了法權、占有和剝削等等的經濟關係。而這些交往或者關係，從來也都不是固定的、封閉的、單向的，它們從來都是多向的、多重的、錯綜複雜的和「多元決定的」（over-determined），而且也是仍在作用著的社會過程。

完全沒有競爭的政治活動，是不能想像的；完全沒有這類的政治活動的社會，同樣也是不能想像的。社會總體既然存在著競爭的政治活動，社會內部各組成成份之間

註^⑤ 在這裡我借用了阿圖塞的觀念，請見阿圖塞，*列寧和哲學*，頁 162~200。泰爾朋是這樣研究意識形態的，請參考他的研究：泰爾朋，前揭書，頁 9~15；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pp. 1~6.

註^⑥ 泰爾朋，前揭書，頁 85；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p. 79.

註^⑦ 泰爾朋，前揭書，頁 83；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p. 77.

和各組成成份內部完全沒有這類的政治活動，也是不能想像的。

命題六：社會總體雖然是不固定的、非封閉性的，但對於社會、社會內部的各組成成份，以及各組成成份內部而言，社會都是當下既有的（given）。這是任何現實的東西最不能磨滅的前提。⁸⁸這說明：一、任何的政治活動都是以現有的現實社會為前提，不能脫離開這個世界來想像問題。二、當下的社會一定都是暫時融合的社會，才能想像它為一個社會。三、在暫時融合的社會裡，對於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而言，任何的政治活動都是如何經營政治，以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為正當性的口實，維繫當下現實社會長治久安的活動；在暫時融合的社會裡，對於非占主導地位的一些「特殊利益」而言，任何的政治活動都是如何進行「接合」的政治，組織建立它們為占主導地位的那個未來現實社會的活動。所以，前者是進行「社會關係的再生產」；後者是進行「文化霸權」的活動。四、當下現實是既有的，主客形勢非常分明。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在這個現實社會裡就是占主導的形勢；非占主導地位的一些「特殊利益」，在這個現實社會裡就是占非主導的形勢。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的政治活動即屬「優勢的實踐」，它們掌有一切有利於它們的資源；非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的政治活動即屬「劣勢的實踐」，它們競奪一切有利於它們的資源或是掌握它們所能利用的剩餘資源。五、當下的社會是既有的，社會的資源屬誰的這點，是由因勢利導的形勢來決定的。「占主導地位」的「特殊利益」，在占有社會資源方面並非就占有絕對的優勢，而是相對的。反之，非「占主導地位」的一些「特殊利益」，在占有社會資源方面也並非就占著絕對的劣勢，而是相對的。所以，在當下的社會裡政治活動圍繞的焦點都是「戰略」和「戰術」的問題。即如何在現有的社會，取得最大的資源為己所用。

命題七：當下社會的主體是人，活生生、現實的人，而且是「活在不以自己為轉移的社會關係中」。因此，人首先是一切社會關係（政治活動、生產關係等等）的當事人（agent），其次是一切社會關係（政治活動、生產關係等等）的承擔者（träger）。⁸⁹但這裡表明的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人活在不以自己為轉移的社會關係中，因此任何人的活動都是受到當下現實社會的制約。不過這個「制約」，並非不能構築的意思。而是正如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所說的：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⁹⁰現實的人是在現實的環境的限制下，一方面「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另一方面也體現「他們

註⁸⁸ 馬克思，「導言」，頁39；馬克思和恩格斯，前揭書，頁23；泰爾朋，前揭書，頁52；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p. 43.

註⁸⁹ 關於這個命題，請參考阿圖塞的分析：阿圖塞，「關於『沒有主體或目的的過程』這個範疇的評論」，*自我批評論文集*，阿圖塞著，杜章智和沈起予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89年），頁114~115。

註⁹⁰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頁121。

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①前者是創造的行動，後者是非自覺地展現的行動。^②當下社會的主體是人，具體的重點在於：具體社會中的大部份人不但非隨心所欲地創造，非有意識地、還以為自己是自覺地創造。當下社會裡存在著的人，大部份都不是自在自然的人，都不是有意識的「個人」、「個體」或「具體的人」，而是從屬於某種關係、某種情況和某種空間等等，受歷史或文化環境影響的「主體」。^③這類的主體，非歷史的造物主，而是社會的「奴隸」。社會內部包含著這兩類的「主體」，因而在社會總體內部的政治面形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社會面形成優勢族群和弱勢族群，在經濟面形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等暫時融合的形勢。

但宰制和被宰制都是相對的，非絕對的；都是從一個層面看的，非全面的；而且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中是暫時的、非永久的；然後還是可以利用「形勢」轉換主客形態，主客易位的。以一個弱勢族群的男性成年成員為例，面對強勢的族群，他可能是在文化、資源分配、權利、政治、經濟、語言、身份地位、空間、時間、教育、住居環境等等方面，受到強勢族群的宰制，但是他在性別、性、家庭或該族群內部，他仍然是宰制者。因而，主體作為一個整體，也是內部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也是不穩定的、不固定的和不定形的狀態。主體作為一個整體，是矛盾暫時的統一體。特別在社會總體作為一個暫時融合的整體時，是如此。

註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前揭書，頁 24。阿圖塞在這裡犯了一個含混的錯誤。阿圖塞和他的合作者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在他們合著的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裡頭，把「人」全部看成是在歷史過程中非能動的主體，而非一部份是能動的主體，一部份不是。好像社會或歷史有某某什麼東西在後面推動一樣。因而歷史不但不是他和巴里巴爾所說的「沒有主體或目的過程」，還是他所盡力反對的「理性主義」、歷史上的「大的主體」（Subject）主宰的過程。他自己的確不知不覺地把這些東西又抬上他的理論舞台。阿圖塞和他合作者的含混，表現在下列的說法裡：「生產關係的結構決定生產的當事人所占據的位置和作用，這些人就他們是這些作用的『承擔者』來說，只不過是這些位置的占據者而已。真正的『主體』（從這個過程構成的主體的意義上說）因此不是這些占據者或行使作用的人，因此儘管有各式各樣的表象，也不是樸素的人類學那樣『現有的東西』的『明顯可見』，即『具體的個人』、『現實的人』——而是這些位置和作用的定義和配置。真正的『主體』是這些定義者和配置者，即生產關係（以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生產關係）。但是因為這些都是『關係』，所以不能在「主體」這個範疇內部加以考慮。」請見 Louis Althusser and É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180. 同樣請見：杰拉斯，「評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New Left Review* 編，徐平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頁 330；Peter Miller, *Domination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7), pp. 2~3. 所以從阿圖塞和他的合作者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思想中的「主體」，全部都是「奴隸」，只能「體現」生產關係，不能「表現」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才是「主人」。

註② 這裡的「展現」，是跟「占有」、「舞台演出」的意思是一樣的。關於「展現」的深刻研究，可以參考：Robert Weimann, "History, Appropriation, And The Uses of Representation in Modern Narrative," in Murray Krieger, ed., *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Text/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5~215; Wolfgang Iser, "Representation: A Performative Act," *ibid.*, pp. 217~232.

註③ 請參考做這類相關區分的下列研究：Kaja Silverman,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6~127.

關於社會總體的具體概念，通過傑索普派的「接合的方法」的理論啓示所生產的理論架構，我們大略用上述七個命題勾勒出。這七個命題所勾勒的圖景，是動態的、不穩定和非固定的東西。照道理是不能在圖紙上勾勒出藍圖的。但我們也說明過，爲了分析邏輯的方便計，我們都把它們稱之爲一個結構。因而切記：它們是在具體現實中「浮動」的指符（signifier）。我們賦予它們點、面、線所構築的空間，都是「多餘的」。而確實從這裡，關於國家理論架構方面的子系統也可以一一建立起來，以前沒有辦法銜接起來的其他學派的研究範疇，經過接合的方法，以新的問題設定改造，也可以用來說明國家層面方面比較微觀的一些領域。自然這就非傑索普派當初提出「接合的方法」所能想到的了。這就是傑索普派的「接合的方法」所提供給我們的最大的啓示意義。從這裡剩下來的理論問題，才是我們要如何找到在這個理論體系的架構中存在著的能夠說明問題和聯繫的那些概念，然後再說明它們之間產生作用的機制，以及所產生出來的效果。當然這裡談到的概念，它們的性質會是屬於各方面的領域，在現實中能夠產生的關聯也會產生非常複雜的效果。這都需要一步步地理論加工進行生產和填補理論空白，才能取得全面的從理論方面來說明的現實圖景。不用說，到這裡我們知道，傑索普派的理論貢獻僅僅在讓我們能夠通過對他們理論的反省和加工工作，對於總的關於社會總體的架構進行理論架構的生產而已。剩下的問題很多，理論工作還有一段很漫長的路程要走，而且工作看起來很艱鉅。

* * *

（收件：91年12月25日，修正：92年6月10日，接受：92年7月1日）



The Inspiration of Bob Jessop and His Discipl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Theory

Chang-chin Chen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Third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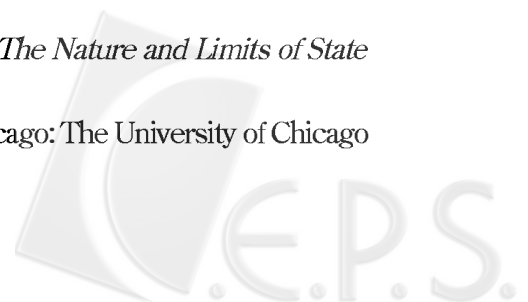
Bob Jessop and his disciples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 of articula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state theory for describing the mode of domination and rule of the state. Yet there exist deficiencies in the method they developed and at times it was hard to apply and articulate the concept used by other theo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correct the deficiencies and expand their method by referring to the problematics which was based on reality. Afterwards, the method of articulation will be a workable instrument for constructing the framework of state theory.

Keywords: Articulation; State; Suture; Society; the Social; Hegemo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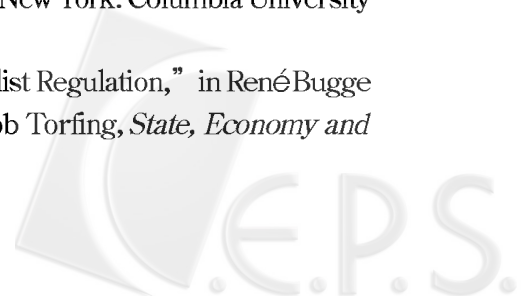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拉克勞和莫菲著，陳璋津譯 (1994)，《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杰拉斯著 (1994)，「評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收錄於 *New Left Review* 編，徐平譯，
《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阿圖塞著，杜章智譯 (1990)，《列寧和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阿圖塞著，陳璋津譯 (1995)，《保衛馬克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阿圖塞著，杜章智和沈起予譯 (1990)，「關於「沒有主體或目的的過程」這個範疇的
評論」，《自我批評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泰爾朋著，陳璋津譯 (1990)，《政權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政權》，台北：遠流出版
公司。
- 泰爾朋著 (1994)，「法蘭克福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選》。
- 馬克思 (1960)，「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 (1960)，「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Abercrombie, Nicholas, Stephen Hill and Bryan S. Turner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Albert, Michael, and Robin Hahnel (1981), *Marxism and Socialist Theory*,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 Albritton, Robert (1999), *Dialectics and Deconstruc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lthusser, Louis and Étienne Balibar (1970),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lthusser, Louis (1977),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eardsworth, Richard (1996), *Derrida &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Bell, Daniel (1988),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tramsen, René Bugge, Jens Peter Frølund Thomsen and Jacob Torfing (1991),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Bobbio, Norberto (1989),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 Boudon, Raymond (1989), *The Analysis of Id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storiadis, Cornelius (1987),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 Cutler, Antony, Barry Hirst and Athar Hussain (1977),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ume 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D'amico, Robert (1989), *Historicism and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Eyerman, Ron (1981), *False Consciousnes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Stockholm: Almo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 Foucault, Michel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 Gasché, Rodolphe (1986), *The Tain of the Mirror: Derrida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ras, Norman (1988),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New Left Review*, 169, 34-61.
 – (1987), "Post-Marxism ?" *New Left Review*, 163, 40-82.
 – (1990), *Discourses of Extremity: Radical Ethics & Post-Marxist Extravagances*, London: Verso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1), "Four Theses on Ide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5: 1-2 & 3, 21-23.
 –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delier, Maurice (1982), "The Ideal in the Real," in Raphael Samuel and Gareth Stedman Jones (eds.),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Graham, L. G. (1980),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D. J. Manning (ed.), *The Form of Ideolog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Heath, Stephen (1977), "Notes on Suture," *Screen*, 18: 4.
- Hindess, Barry & Paul Q. Hirst (1975),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ess.
 – (1983),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An Auto-Critique of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Hindess, Barry (1977),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ussex, U. K.: The Harvester Press.
- Howard, Dick (1989), *Defining the Politica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Iser, Wolfgang (1987), "Representation: A Performative Act," in Murray Krieger (ed.), *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Text/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acob Torfing (1991), "A Hegemony Approach to Capitalist Regulation," in René Bugge Bertramsen, Jens Peter Frølund Thomsen and Jacob Torfing,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Jacques Derrida (1986), *Speech and Phenomenon*, New York: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y, Martin (1984),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 (1982),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Oxford, U. K.: Martin Robertson Press.
- (1991), “Foreword,” in René Bugge Bertramsen, Jens Peter Frølund Thomsen and Jacob Torfing,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90),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Press.
- Laclau, Ernesto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Press.
- (1991), “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5: 1-2 & 3, 24-26.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7),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166, 79-106.
- (1985), *Hegemony &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Press.
- Larrain, Jorge (1979),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 (1984),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 Lefort, Claude (1991), “On the Genesis of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5: 1-2 & 3, 46-86.
- Leftwich, Adrian (1984), “Politics: People, Resources and Power,” in Adrian Leftwich (ed.), *What is Politics? The Activity and Its Stu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 Lukács, George (1983),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London: Merlin Press.
- Macdonell, Diane (1987),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Manning, D. J. (1980), “The Place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Life,” in D. J. Manning (ed.), *The Form of Ideolog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Mórkus, György (1991), “Concepts of Ideology in Marx,” 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5: 1-2 & 3, 87-106.



- McCarney, Joe (1980), *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Miller, Jacques-Alain (1977/1978), "Suture Elements of the Logics of the Signifier," *Screen*, 18: 4.
- Miller, Peter (1987), *Domination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Mouffe, Chantal (1993),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Press.
- Parekh, Bhikhu (1982),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Croom Helm Ltd.
- Silverman, Kaja (1986), "Suture," in Philip Rosen (ed.), *Narrative, Apparatus, Ideology: A Film Theory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he Subject of Semio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rborn, Göran (1980),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Press.
- (1980),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State Apparatuses and State Power under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 (1983),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New Left Review* (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Verso Edition.
- Thompson, Kenneth (1986), *Beliefs and Ideology*, Sussex: Ellis Horwood Ltd.
- Weimann, Robert (1987), "History, Appropriation, and The Uses of Representation in Modern Narrative," in Murray Krieger (ed.), *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Text/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stergaard, John H. and Henrietta Resler (1975),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